

編後語

過去的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驚人。然而，並非所有國人均能大體平等地從經濟的高速成長中獲益。眾所周知，中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逐漸拉大到危險的地步，而相當一部分公共服務的可及性更愈來愈低，民眾的「基本需要」無法得到滿足。其中，醫療、教育和住房成為當代中國民眾不得不肩負的「新三座大山」。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分述「新三座大山」的由來以及鏟除之道。顧昕簡要介紹了中國醫療體制的弊端，分析了改革的兩種思路，一種主張在醫療服務領域回歸計劃體制，另一種主張在健全醫療保障體系的同時，推進醫療服務走向有監管的市場化。當醫療服務全面回歸計劃體制已經不大現實之際，如何在政府扮演積極的角色與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之間尋找平衡，乃是中國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必將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楊東平之文詳細考察了中國教育市場化、產業化對教育公平的各種負面影響，以及政府在教育公共政策上着重社會公平的諸多轉變。當持續多年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受到阻擊和矯正之時，中國的教育改革面臨着同醫療改革相類似的問題，這就是政府看得見的手究竟應該伸向何處，以及伸得多長。同樣，朱亞鵬的文章指出，中國住房政策實際上已經走上了市場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之路，但政府在促進住房公平化方面未能扮演好應該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上未盡其責。政府和市場如何各司其職、各顯其能、相得益彰，這是中國各個公共服務領域改革的核心。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選用了三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側面討論了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對西人和西方文化的認知，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范廣欣發現，郭嵩燾著名的「懷柔遠人」理念，並非來源於他出使西洋的心得，而是發源於儒家文化的薰陶。賀昌盛的研究表明，「文學」學科在近代中國的出現並非完全是西學移植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詞章之學」為現代「文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而近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出現是「文學」學科基本形態最終確立的主要動力。陳首分析了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新青年》和《科學》雜誌對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傳播，並且同1930年代科學化運動對「科學救國」的鼓吹進行了比較，描述了「賽先生」從啟蒙者到意識形態維護者的演進過程。

「人文天地」欄目選用了張玲霞討論「韋君宜現象」的文章。韋君宜具有雙重社會角色。一方面，她曾經是文藝部門中一個位階不高的領導幹部，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位作家。當中國作家一窩蜂地熱衷於傾訴其作為受難者的苦難經歷之時，韋君宜在其生命的最後歲月，卻深刻反省了知識份子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到極權主義施害行動的歷史過程。在「政治與法律」欄目，梁治平通過對一個案例的分析，突出了把「伸冤」行為解讀為「維權」行為的種種誤讀之處，透視出維權的制度化在中國依然任重道遠的嚴酷現實。